

人口学视角下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反思

毛 勇

【摘 要】在过去的 50 多年里,中国高等教育规模速度的发展经历了多次的剧烈波动。本文在对中国高等教育规模速度发展及中国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变动回顾的基础上,对影响高等教育规模速度发展密切相关的高等教育适龄人口进行了分析。决策者应考虑国情,科学地看待人口因素对高等教育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影响。

【关键词】人口学 高等教育适龄人口 高等教育 规模速度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 - 8418(2006)03 - 0029 - 03

【作者简介】毛 勇,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生。福建 厦门 361005

教育以人口为对象,人口又以教育为条件。人口包括人口数量、人口结构、人口质量、人口分布等不同的指标^[1],不同的指标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也有区别。人口数量的变化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高等教育的规模与速度,及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而人口结构的变化则会对高等教育的专业设置和课程结构产生显著的影响。人口因素既可成为高等教育规模速度发展的一种有力的推动资源,也可成为其继续发展的负担。“人口与教育的关系是极为错综复杂的关系,教育既可以是人口变化的一个原因,也可以是人口变化的一种结果”^[2]。人口与高等教育两者相互间的影响,具有很长的时间差。人口数量的变化大约要在十几年以后才会对高等教育产生显著的影响。随着世界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及社会产业结构的优化,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的工业国家都必然有一个高等教育规模发展迅速的突飞期。在建国以来的 50 多年中,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规模与速度在实践上出现过几次大起大落,探讨高等教育适龄人口与教育的关系,有助于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高等教育发展规模速度,有利于决策者制定合理的教育政策。如何理解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对高等教育规模速度发展的影响与制约,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高等教育规模速度发展回顾

在建国初期,我国根据当时的国情积极探索

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道路,普通高校招生人数从 1950 年的 3.1 万人到 1952 年的 7.9 万人,3 年增长了 2.5 倍。在教育大跃进时代,走的是外延式增长的道路,普通高校招生人数从 1958 年 10.6 万人到 1960 年的 32.3 万人,3 年增长了 3 倍。高等教育规模的高速扩张主要是决策者主观意愿的反映,严重地脱离了当时的社会发展实际。进入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鉴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规模速度几次剧烈波动,以高等教育发展规模速度为主题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认为大力发展的观点有之^[3],认为应当严格控制的观点有之^[4],认为应适度发展的观点也有之^[5]。到了 20 世纪末及 21 世纪初,为了拉动经济,普通高校招生人数从 1999 年的 109 万人到 2003 年的 382 万人,5 年增长了 3.6 倍。上述不同的观点均有各自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操作意义,但不难发现,他们更多地以经济发展为视角考察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规模速度,人口因素及广大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的强烈需求对发展规模速度的影响却极少受到关注。

二、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变化

在过去的 20 世纪中,中国人口由约 4.5 亿增长到近 13 亿人。有些人口预测结果表明,中国人口将在 21 世纪三四十年代达到 15~16 亿的高峰值后逐步下降^[6]。而建国以来随着中国人口的激增,高等教育适龄人口也在大幅度攀升。

分析和对比近 50 多年的中国高等教育适学

人口数变化情况,笔者将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数变化分为四个时间段:1949~1966年、1967~1982年、1983~1994年、1995~2000年。其人口数分别在4400~5900万人、6200~9300万人、10300~10500万人、9200~9600万人之间变动。从目前我国实际情况来看,高等教育适龄人口预计从2005年到2008年前后,每年普通高中毕业生将增加80至120万,普通高考报名人数将增加100至160万左右^[7]。国内有关学者预测^[8],在未来的50年时间里,中国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将出现“两峰两谷”的变动。面对如此巨大的中国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数,决策者在研究和制定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规模速度的政策时都是不能不考虑人口因素的。

三、几点反思

1. 高等教育发展规模速度与人口的关系。人口作为社会发展经常和必要的条件,对高等教育的发展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和作用,人口与高等教育的关系是一种相互制约、相互适应的关系。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在高等教育规模速度发展中既是张力,又是压力。一方面,从人力资源开发的角度,人口增长既能促进社会的发展,通过经济增长来促进高等教育发展;另一方面,人口增长也会延缓社会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几个高等教育规模发展的高峰都与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因素密切相关。比如,美国、法国、英国、德国(西德)、日本等国在二战后的1950~1970年间,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大大提高。基本上沿着“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增长—经济增长—高等教育规模增长”这一基线发展。上述西方发达国家在进入大众化初期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高中教育普及水平占高中适龄人口的60%以上,人口城市化水平已超过50%^[9]。相比,中国与之对应的高中教育普及水平及人口城市化水平2002年为42.8%^[10]和39.01%。然而,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口出生率下降,韩国也于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人口下降趋势。高等教育适龄人口下降,同样也让高等教育系统感到棘手。开始是在初等教育阶段,然后逐渐影响到高等教育阶段。这一人口变化,改变了几十年来工业化国家因人口压力而形成的以高等教育扩张为主的教育政策,高等教育适龄人口的减少使它们的教育政策在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高的过渡中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中国高等教育适龄人口2008年后将开始下降,至2020年,仅为7200万人,只相当于2008年一半多一点,也可以说,在未来的15年里,即使中国的高等教育总规模不再扩大,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也

将扩大1.7倍,在2020年时达到36%~56%^[11]。可以预见,到那时中国高等教育“买方市场”的出现将是不可避免的。

2 由于在1958年至1960年间提出“15年普及高等教育”的不切实际的口号,中国高等教育进入了超常规的“大跃进”发展轨道,高校招生数有几年居然超过普通高中的毕业生数,甚至连未毕业的高中二年级学生也被招入大学。由此可以客观地说,中国有目标、有计划地推动高等教育向大众化方向发展的运动应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实践已证明,在没有基础教育作保障、缺乏足够的高中毕业生生源的情况下,盲目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和速度只会更多地体现长官意志。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到90年代末的20多年间,中国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平均每年在1亿人左右,而1980年大学招生人数仅为27万人。实际上,20世纪七八十年代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为1%左右,90年代起超过2%,而中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增长率每年平均在9%左右。中国在制定高等教育发展规模速度的政策时,一味地通过人为地控制在校生数量来控制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却很少更多地考虑中国巨大的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及人民群众的需求。当时中国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数量如此庞大,但为什么高等教育的规模和速度连续近20年发展却如此缓慢呢?究其原因,其一,当时的人们思想观念相对保守,加上中国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总认为高等教育只能是精英教育,办学体制单一,没有意识到数量与质量是对立的统一。高等教育的规模的确定更多表现为政府限定在校生人数的国家主义行为,而很少关注以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数量来确定高等教育的规模。“只注意质量而不注意数量是片面的。我们现在就应该想到这一点,改变这一点,不要等后人写历史时再来总结教训。”^[12]然而,在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阶段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规模速度受高等教育适龄人口的影响将变得越来越明显。其二,没有重视人力资本的理论在人口质量上所起的作用,没有及时将第一人口大国转变为人力资源强国,忽视了人口因素对高等教育的影响。

3 2004年,中国13亿人口中只有2000万在学的各类高校生,仅占全国总人口的1%多一点,虽然中国2004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超过19%,已经跨入大众化发展初级阶段。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仅相当于美国1941年、日本1970年、韩国1980年的水平。1996年,高收入国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就达到62%的平均水平,美国、加拿

大则超过了 80%。高等教育工作的一个重要规律,就是人才培养的长周期性,高级人才的培养周期则更长。高级人才培养的长周期性,要求高等教育发展规模速度必须适当超前发展,对高级人才必须保有一定的储备。教育规模受高等教育适龄人口供给与需求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由于中国高等教育适龄人口的数量日趋增长;另一方面,中国高等教育已进入大众化的门槛,正在向普及化迈进。由于今后一个时期高中阶段学生规模快速增长,必然会进一步加大对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的压力。面对今后 50 年高等教育适龄人口的“两峰两谷”的波动形势,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规模速度不仅要充分考虑人口因素对高等教育的影响,还要考虑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及需求。将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变为人力资源是树立科学的发展观,确保高等教育规模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

4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对高等教育的“反哺”能力较弱,加之过分地单纯地依靠国家和政府的办学体制,抑制了社会力量对高等教育投资的积极性,只依靠政府办高等教育,势必影响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中国尚属于私立高等教育不发达水平的国家,2004 年,中国(大陆)民办高校及其在校生数占全国高校及在校生数的比例分别为 41.34% 和 18.38%^[13]。在未来 15 年里,中国将有 2 亿农业劳动力转向非农产业,城市制造业的人口要向服务业转移,中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和经济结构向高层上移的阶段,高等教育人才需求旺盛,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将持续增加。但同时,为了缩小城乡和地区教育差异、扩大教育公平,国家教育财政拨款将更多地向农村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倾斜。在此情况下,未来 15 年需要新建近 1000 所高校才能满足中国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入学的愿望,应主要依靠社会资金的投入。也就是说,中国未来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要更多地通过体制创新。20 多年前,中国私营经济对 GDP 的贡献率几乎等于零,2004 年,个体和私营工业已占全国工业增加值和销售收入的 40%,占全国商品销售总额和零售总额的 60% 以上^[14]。潘懋元教授对未来中国民办高等教育 15 年有一个明确预测,我国多种模式的民办高等学校及其学生可能达到高等教育人数的 1/2 以上^[15]。

5 人口对高等教育的影响还体现在人口产业结构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社会产业结构的升级。人口的产业结构是指劳动人口在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以及各种职业中的分布状况和比例关系^[16]。在中国,人口产业结构的突出特征是第一

产业人口所占比重过高,第三产业不发达。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由第一产业占主导地位到第二产业占主导地位,这是从农业国向工业国,或者可以说是实现工业化、国民经济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由于这是体力型职业结构向脑力型职业结构的转变,因此,高等教育在这一转变中必将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高等教育适龄人口的变动不仅是一个数量上的问题,它会影响到中国高等教育的结构、质量、办学形式多元化,继而影响到产业结构与社会结构等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因此,决策者应考虑高等教育适龄人口的因素,认真研究中国高等教育适龄人口超增长因素对高等教育规模速度、结构、层次等方面的深度影响,主动地适应中国经济产业结构的升级。

【参考文献】

- [1] 佟新. 人口社会学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401.
- [2] 鲁洁, 吴康宁. 教育社会学 [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1. 244.
- [3] 何祚麻, 兰士斌. 高等教育适度发展, 还是大力发展 [J]. 上海高教研究, 1998, (7).
- [4] 周贝隆. 高教发展规模的战略选择 [J]. 高等教育研究 (武汉), 1996, (2).
- [5] 潘懋元. 潘懋元论高等教育 [M].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0. 266.
- [6] 谈松华, 王蕊, 王建. 中国区域教育现代化研究 [A]. 中国教育: 研究与评论 [Z].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2, (2): 30.
- [7] 张保庆. 树立科学的发展观, 确保高等教育持续健康发展 [J]. 中国高等教育, 2003, (10).
- [8] 高书国. 21 世纪初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预测与分析 [J]. 教育发展研究, 2002, (4).
- [9] 蔡克勇, 韩民. 中国高等教育一办学与管理体制改革研究 [M]. 南宁: 广西教育出版社, 2002. 208.
- [10] 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 中国教育年鉴 2004 [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4. 93.
- [11] 谢作栩. 中国高等教育规模发展宏观调控模型研究 [J]. 高等教育研究, 2004, (6).
- [12] 翟葆奎. 教育与社会发展 [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9. 575; 宋健. 人口与教育 [J]. 自然辩证法通讯, 1980, (3).
- [13] 徐绪卿. 新时期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研究 [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5. 49.
- [14] 刘新武. 非公经济成为经济增长重要推动力量 [N]. 光明日报, 2005 - 10 - 10 (5).
- [15] 潘懋元, 林莉. 2020: 中国民办高等教育的前瞻 [J]. 浙江树人大学学报, 2005, (3).
- [16] 彭坤明. 知识经济与教育 [M].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173.

(责任编辑 邱梅生)